



陳銘城 攝影

他的命運都是在拖磨

— 李守信訪談紀錄（李永壽的長子）

我是李守信，李永壽的長子。我四歲時，父親李永壽被抓去關，聽說只是認識當時的蘆竹鄉長林元枝，那時他正因政府要追捕而逃亡。那時我還太小，不太知道很多事情。知道父親要被關十年，不能回家，家裡沒錢，生活很不好過，我上學時，連一雙鞋子也沒有。其實，那時候讀書不像讀書，幾乎都在種甘藷、挖甘藷，和母親辛苦種植一坵無水田（旱田）。當時，有位鄰居親戚李傳根和他兒子，常牽牛來幫忙犁田，又不用收錢，稻穀收割後晒乾，再挑去碾米，我和母親做的最累，弟妹都還小，我就是家裡的長工。

爸爸被抓 窮到欠稅賣田求生

那時，連我阿公也被抓去關兩個多月，拿到自首證，才放他回家。去面會爸爸都是阿公去的，有時媽媽也會跟去，我曾經和阿公去看過一次爸爸，應該是在軍法處看守所，我不是記得很清楚。爸爸被抓後，阿嬤哭得很傷心，她四處要打聽消息，但沒有用。面會時，阿嬤都會事先烤乾豬肉，那是在鍋內不斷地烤乾豬肉塊，這樣才能放久一點，不會很快壞掉。爸爸在新店軍監時，阿公常寫紙條和爸爸連絡，有時是將字條塞在挖洞後的肥皂，最常用的方法是縫進他的褲腳折縫處。當時家裡實在太窮了，沒錢繳田租，因此欠稅，記得我家中午都沒人敢在家吃飯，每天都在阿嬤的指揮下，躲到相思樹園扒飯吃。但家裡還是遭查封，我家的門邊被貼封條，我們怕鄰人看，又貼上別的紙條遮掩，連我家的一部裁縫車也被帶走。其實那裁縫車是我小姑媽的，最後不得已，阿公只好賤賣一甲多的田

地，去繳納欠稅，結果剩不到多少錢可生活。這些欠稅賣田的事，家人都不敢讓坐牢的爸爸知道，以免他窮著急。後來爸爸去綠島，我們都有和他通信。

十年後出獄 靠農耕賺錢餬口

我阿公是讀書人，不是粗作人，他的手很細嫩，不曾下田耕種。記得爸爸坐牢時，阿公每禮拜有三天，去臺北的貿易公司為人記帳。他也到桃園車站旁，我四姑婆的夫家開設的店，去幫忙記錄載豬去臺北賣的帳，當然，那是親戚的好意幫忙。印象中，阿公的書桌上，一直都擺放著硯臺、毛筆、沾水筆，他都拿毛筆寫書信給我獄中的爸爸。爸爸被抓前，已有三個孩子，分別是四歲的我，二歲的二弟守義、和出生兩個月的妹妹素妙。父親出獄後又生下弟弟和么妹。我們都沒錢可念書，我念南崁初農畢業後，就去臺北市基隆路的汽車修理廠工作。不久，爸爸就出獄回家。他已經因坐牢十年，不可能再回蘆竹鄉農會工作，其他工作遭遇許多干擾，最後還是打零工和做自家的旱地。他挖池塘埋水管、引水，開始和二弟一起種水果，芭樂、蓮霧，這期間又生下老四守和與么妹素娟。那時每天早上三點多就起床，只要看見水果顏色很好時，就穿起袖套防蚊，摘水果，再分類，分裝好後，就由爸爸和二弟騎腳踏車，從蘆竹鄉



李永壽的開釋證明書。

南崁騎車送到桃園的南門市場與永和市場，交給批發商賣，賣價還夠成本，賺一點工錢糊口。

政治犯之子 當兵常被問話

這期間，我白天在臺北汽車保養廠工作，晚上到電子傳授所學技術。二年後去當兵，除了在新兵中心外，我被送去陸軍通訊兵受訓十六個月，成為雷達兵的修復員，有六個月的時間，被派在基隆鼻頭角當雷達兵。當兵時，因為父親是政治犯，常被叫去問話，但是我有電訊專長，問過後都沒事。

退伍後，我考上將軍牌電視服務站，負責外出到客戶家維修電視。剛去時，月薪只有兩千多元，機車由公司提供。我從一九六二年開始做了十二年，一直到公司結束營業。我先在臺北的服務處，第三年派去基隆市，再回臺北，四至五年後，接臺北區班長，負責安排客戶服務的維修服務，安排調度。結束將軍牌電視的修復工作後，我回到蘆竹鄉南崁老家與父母同住，我和以前將軍牌的同事分工合作，從事電器產品的修理工作。除電視外，我也去臺中受訓，修理冰箱，一直做到近年來，身體不好，走路腳不舒服，才逐漸退休。

腦瘤開刀 病痛十年後解脫

我爸爸在一九九八年開始身體不適，起初不知是腦部長瘤，後來發現不能走、不能講，很多事記不起來，去林口長庚醫院檢查後才知是腦瘤，開刀後拿下頭蓋骨，半年後才裝回頭



1998年9月23日，李永壽腦
瘤開刀後在家休養。（陳銘
城 攝影）

蓋骨。此後狀況不斷，又是血液感染，一下又是尿道感染，醫院進進出出，這十年的臥病，比他以前年輕時坐牢還要痛苦，他不能走路，樣樣都要家人照顧，母親和我夫妻三人照顧他，卻讓他覺得拖累家人，一直想自我了斷。在寒冬四到五度時，他不穿外套，要我們推他的輪椅到屋外，他想自我了結，但自己卻無能為力，那些日子，我家的刀子、打火機都收起來，就怕他輕生。父親晚年的十年病痛，應該比他年輕時的十年黑牢還要痛苦。二〇〇八年，他終於結束病痛，離開我們，不再有人世間的拖磨，享年八十三歲。

一張合照 打入黑牢

一 李永壽訪談紀錄

任職蘆竹鄉農會 戰後通膨嚴重

我是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生於桃園縣蘆竹鄉五福

村。我在公學校畢業後，就在日本時代的「蘆竹庄信用販賣利用組合」擔任「給士」（日文，工友），後來升為信用部、出納部雇員。一九四四年因為戰爭中，兵源不足，我在十八歲時被警備徵召，調到大園軍用機場（原「圈仔內」），擔任警備工作一年，到戰爭結束。終戰後，我回到蘆竹鄉農會復職。

蘆竹鄉農會的正對面，就是蘆竹鄉戰後第一任鄉長林元枝的家，我和家父李萬福都和林元枝鄉長熟識、友好，經常交往。特別是他當鄉長，我父親李萬福當蘆竹鄉農會常務監事，也是農會販賣部主任，而我不久後在蘆竹鄉農會主辦蘆竹鄉公所的公庫存款，和林元枝鄉長更常碰面連絡，林元枝待我情同父子。

二次大戰結束，臺灣光復後，原本我對祖國很期待，但是後來發生二二八事件，加上舊臺幣四萬元換新臺幣一元，我家財產幾乎都不見了，只剩下一點的土地。當時家裡大都放現金，錢都變得不值錢，讓我對祖國非常失望。我在農會當出納時，看到來農會提款或存款，都要叫卡車載一布袋、一布袋的舊臺幣的錢。

奉公守法 未參加圈仔內行動

說起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，當時從臺北爆發民怨衝突後，蘆竹鄉也受到影響，群情激憤，人心惶惶，大家不滿陳儀政府貪汙腐敗。這時，蘆竹鄉長林元枝出面，組成「公安隊」，穩定地方秩序，保護鄉公所和農會。我知道農會司機

李火爐（我的結拜大哥）開車，載林元枝鄉長、水利會職員詹木枝和其他的青年，總共約二十多人，到大園鄉軍用機場接收槍械，做為「公安隊」維持治安的武器。但是「公安隊」的成員，良莠不齊，被政府認為是叛亂分子。不久，二十一師從中國增援來臺，展開鎮壓報復，許多各地民眾慘遭殺害和逮捕。桃園、南崁一帶，雖然當時的死傷比較不嚴重，但是事件後展開秘密搜捕行動。特別是逃亡的鄉長林元枝和跟隨他的青年，這些曾參加二二八反抗行動的人，早在三月初就逃亡了，他們成為事件結束後的主要追捕對象。

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間，清鄉白色恐怖的搜捕行動持續進行中。我們蘆竹鄉南崁鄉間，瀰漫著恐怖的低氣壓，連夜晚都隨處布滿便衣人員，分持手電筒搜索民家，到處風聲鶴唳，人心惶惶。有人走避，躲躲藏藏，人人自危，好像隨時隨地都有被抓的可能，更有人不敢回家睡覺。至於我自己，自認沒參加去「圈仔內」的行動。平日奉公守法，不曾做過違規違法的事，因此和往常一樣地上、下班，做自己份內的工作。

六位結拜兄弟均遭波及

我因為受日本教育，國語不好，為了工作的需要，我跟農會總務人員干彼得¹學國語，他是臺中一中畢業，曾去過中國上海，戰後回來蘆竹鄉農會，他不參與政治的活動，我和其他

1 干彼得（1989-1971），參見曾文敬主修，〈第十二章 人物傳略〉，《蘆竹鄉志》（桃園縣蘆竹鄉：桃縣蘆竹鄉公所，1995），頁825-829。



1997年10月1日李永壽重返綠島，在新生訓導處舊圍牆遺址前留影。（李守信 提供）

五位好友跟他學國語，我們還因此成為結拜兄弟，卻都在白色恐怖時期遭殃。這六位結拜兄弟依年齡排行如下：老大李火爐是農會司機，曾載林元枝等人去「圈仔內」，接收槍枝，他沒逃亡，但去自新。老二林葉洲²，當時蘆竹鄉公所職員，後來回苑里鄉公所任職時被捕，因林元枝逃亡時，去找過他，他提供一包白米給他，竟被判死刑。老三就是我李永壽，在蘆竹農會職員，後來被關十年。老四呂喬木³，是蘆竹鄉公所職員，也是我的好友，他跟隨林元枝、吳敦仁⁴一起逃亡五至六年，

2 林葉洲，參見本書〈清鄉逃亡的黑暗日子：吳敦仁訪談紀錄〉，註解13。

3 呂喬木，參見本書〈苦難折磨教會我的事：林秀峰訪談紀錄〉，註解6。

4 吳敦仁（1923-1999），參見本書受難者簡介、〈清鄉逃亡的黑暗日子：吳敦仁訪談紀錄〉、〈二二八改變父親的一生：吳泰宏訪談紀錄〉。

最後才和林元枝、吳敦仁一起出來自新。老五黃玉枝⁵ 是南崁國校的老師，他沒逃亡，在學校被捕，慘遭槍決。老六張金枝是蘆竹鄉農會的倉庫管理員，他也沒逃亡，但去辦自新。

經林元枝介紹 認識簡吉

我曾經在林元枝鄉長的介紹下，認識簡吉⁶，知道他是從事農民運動的人，是「農民組合」的領導人，為人正直，對農民的問題很關心和瞭解。後來張志忠⁷ 和周慎源⁸ 一起來過我家，我招待他們吃便飯。我知道他們在逃亡，他們拿出油印的《青年修養》雜誌，告訴我說：「青年應多看書。」後來我才知道：張志忠是地下黨的武工部長，和簡吉一樣，被捕後都被槍決。周慎源則是師範學院的學生領袖，一九四九年臺大和師範學院因要逮捕他，而發生「四六事件」，他逃亡到桃園縣來。後來聽說他在桃園中路被刑警開槍打死。林元枝逃亡時，多次來我家見到我和家父，我們都請他吃家常便飯。

我聽說，南崁有位國校老師吳哲明⁹，警察到學校去抓他，卻不認識他的長相，而向他本人問：「吳哲明的教室在哪

5 黃玉枝（1927-1953），參見本書受難者簡介、〈為冤死的大哥哭泣：黃玉麟訪談紀錄〉。

6 簡吉，參見本書〈運轉手的人生：陳景通訪談紀錄〉，註解19。

7 張志忠，參見本書〈回家的路等三十三個年頭：徐文贊訪談紀錄〉，註解14。

8 周慎源，參見本書〈回家的路等三十三個年頭：徐文贊訪談紀錄〉，註解11。

9 吳哲明，南崁國校教師，後躲避而未被捕。



吳敦仁（左）曾為李永壽（右）申請二二八補償時作證，李永壽因林元枝案件被關10年。（陳銘城 攝影，1997年12月4日）

裡？」他機警地指前頭較遠的教室說：在那個教室後面，他立即逃走，後來出來辦理自新。

我與黃玉枝同時被捕 慘遭刑求

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近九點，我在蘆竹鄉農會辦公室內，正埋頭抄寫報表時，兩位便衣人員，在派出所尤姓警員陪同下，來農會告訴我說派出所裡有人要找我，我跟隨他們出去後，卻被押上早已等候在外的車子，那是保密局的鐵箱子車。十幾分鐘後，看到結拜的黃玉枝老師也被押上車，在車上有保密局的便衣監視，我們無法多交談，黃玉枝說了一句話：「到達後，打下去就知道了。」我們先被送到桃園審訊，當天晚上，就送到臺北市小南門的保密局南所。雖然自認沒參加二二八反抗行動，沒參加任何組織，但是卻慘遭刑求，他們一再追問我跟林元枝的關係和他的行蹤。我說：「他是我

父親的世交，也是我在農會承辦鄉公所公庫業務的公務關係的客戶。」我起初以為是林元枝鄉長逃亡而我才被抓，後來才知道，因逃亡時的林鄉長來家吃過飯，家父也被關押兩個多月，之後准他辦理自首。

一張合照 竟成為扣押證據

更要命的是，我事後才知道，保密局人員搜出一張我們結拜兄弟的合照。那是我和呂喬木（當時和林元枝一起逃亡）、黃玉枝老師、林葉洲等人的合照，被當成扣押我的證據。拘留一個月後，我被轉送臺北市大橋頭的保密局北所，那裡原本是辜濂松媽媽辜顏碧霞擁有的高砂鐵工廠。因辜顏碧霞被控資匪罪¹⁰，她不但自己被關在自家的工廠裡，還關了許多政治犯，文學家葉石濤¹¹也曾經關在那裡。

我的案子，被擱置了三年，直到林元枝、呂喬木出來自新後，才再問我是否知道他們已經結束逃亡，出來自新。我回答說：「他們出來最好，歡迎和他們對質。」一九五三年，我被押送到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，經歷過不計其數的疲勞審訊、刑求逼供，起初是要我說出林元枝的藏匿處，後來他自新了，卻要逼我承認參加共產黨，但始終沒有證據，我雖免於

10 辜顏碧霞因資助女兒家庭教師呂赫若（1914-1951，作家，人稱「臺灣第一才子」）辦大安印刷廠，印刷共產黨書刊，呂逃亡到鹿窟山上，後來被蛇咬死。

11 葉石濤（1925-2008），臺南人，作家。涉1953年「省工委台南支部黃添才等案」，被判刑5年。

死罪，卻仍然在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一日，以「曾連續參與叛亂集會」的罪名，判刑十年，當時我已被關押超過兩年半。

一九五四年三月八日，我被移至新店國防部軍人監獄，在那裡長達六年之久。林元枝的二哥王傳境，因林元枝逃亡，他被捕關在新店軍人監獄，卻不幸病死在監獄裡。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九日，我的刑期只剩八個月，但還是再送到臺東綠島的新生訓導處服刑，直到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刑期屆滿出獄。

家道中落 土地盡失病痛纏身

我在坐牢的十年期間，家中生活陷入絕境，家父曾於一九五一年向相關單位陳情，要求以「生活無依」的理由，希望申請釋放我回家，但是不被准許。家裡經濟困難，無錢繳交各種稅捐，先是法院催討，一籌莫展，財產一度被查封。逼不得已，家父只好將僅有的一甲多的水田變賣，得款七千多元（當時稻穀每公斤約七角，一萬兩千公斤稻穫，扣押付給佃農權利一千四百四十公斤，實得一萬零五百六十公斤）繳交滯納稅金後，所剩無幾，連勉強糊口都很困難。

我被捕時，不但家有年邁父母，被捕時的二子一女，分別是四歲、兩歲、以及剛出生兩個月大的孩子。家庭不但面臨生活的困頓，還要忍受鄰居親友的孤立，這樣的雙重煎熬。一直到我出獄，白色恐怖的苦痛，仍然沒有減輕，我還被管區警察監管一、二十年。

出獄後，我家連水田都賣掉，沒田可種。而坐牢十年的叛亂犯罪名，讓我求職機會，屢遭封殺。加上我因被捕時遭到嚴重的刑求，身體受到傷害，全身筋骨和脊椎因被刑求受傷，罹患風濕、酸痛難忍。我只能在南崁鄉下為人打零工度日。至於因坐牢而損失的財產，光是我父親賣掉的水田，現在都被劃為住宅區，地約八百一十坪，每坪的公告地價七萬多元，算起來就有五千八百多萬元的財產損失。更嚴重的是，因為我坐牢，家道從此中落，我的孩子都無法受好的教育，到現在都還是過著做工的苦命生活，這是我的怨歎。

採訪時間	採訪地點	主採訪者	說明
2014年7月12日	蘆竹鄉羊稠村李家	陳銘城	本計畫
1994年10月	蘆竹鄉羊稠村李家	陳銘城	採訪李永壽

錄音轉文字稿：陳銘城

文字稿整理：陳銘城

修稿：陳銘城、曹欽榮